

“妞”的形义演变与满汉文化关涉

薛瑾¹ 周密²

(1. 浙江树人学院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2. 浙江古籍出版社)

提 要 宋代伊始,“妞”字作为古“𡗗”的讹误而产生。“妞”是形声字,最初其形旁“女”并非专指女性,据“声符有义”原则,其声旁“丑”也无“丑陋”“丑恶”义,而是承接古“𡗗”的“好”以及宋时的“高丽姓”二义而来。清中叶后,满语与汉语融合,“妞”有了“未婚女孩”之义,“妞妞”成为满语 Nio nio([nio:nio:])的汉字音记,此乃彼时“满式汉语”之特色。“妞”字复杂的古今异变,既揭橥了汉字简繁转换中“一对多”现象,又体现了汉满两大民族语言、文化次第交融的过程。但其体变结果,不能以满汉两族语言最终调和无二而片面视之,还关涉到双方内部的语言形塑、自我修补,以及各自民族体认与情感留存因素,这对追溯今日北京方言的真实演变规律,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 妞 音形义 演变 满语

“女丑”为“妞”,此论断关乎汉字“妞”古今音形义的发展与演变。从唐至清,多有学者探讨,尤其是清代考据学家为我们提供了较为严密的考证过程,但其观念受到当时学术思潮和流派限制,并未涉及满语与汉语言的接触融合,更未与现代汉语的形义相贯穿。下文先梳理“妞”音形义的发展演变历程,再考辨之。

1. 从“𡗗”到“妞”——“妞”的音形义演化历程

先谈“妞”字音形义的发展与演变。《说文解字·女部》中并无“妞”字,卷十二下载:“𡗗,人姓也。从女,丑声。《商书》曰:‘无有作𡗗。’”(许慎,1963:258)另《广韵》也将“𡗗”归入“呼到切”(陈彭年,1912:41),未提及“妞”。以上论著追溯“𡗗”之起源,并未谈及与“妞”有关联。

但在宋代编撰的字典或训诂书籍中,出现了“妞”字,并将此字与古“𡗗”合二为一,至此宋人对“妞”字的认知始现分歧。《宋本玉篇》将“妞”与“𡗗”视为同一字:“妞,呼道切。姓也。亦作𡗗。”(陈彭年,1983:64)《集韵》将“妞”归“有”韵,“女九”切(丁

度,1983:901)。司马光(1987:458)也将“姁”阐释为“姁,女九切。姓也,高丽有之”。他们均认为“𡗗”“姁”为一字,但是关于“姁”的读音,却以为是“女九切”非“呼到(道)切”,值得注意的是,增加了一个“高丽姓氏”义。后北宋末《古今姓氏书辩证》(邓名世,2006:394)便综合前说,将“姁”与“𡗗”二字的演变进行了梳理:

𡗗 音好,未详。案𡗗乃古文好字,《广韵》《集韵》俱不言人姓。《正字通》曰俞字变体为𡗗。俞姓虽有表见者,然一音丑,一音好,声亦不类今。案今《字典》有姁字,女久切,音纽,姓也。高丽人有之。𡗗疑即姁氏之讹,然《广韵》载𡗗而无姁,今仍其旧云。

邓名世之说是彼时解释“姁”音形义演变的代表性观点。据此,因《广韵》《集韵》不载,古似并无“姁”字,与“𡗗”更无渊源。“姁”于北宋始现,以“𡗗氏”为“姁氏”,被视为“𡗗”的异体字。换言之,“姁”从宋代出现,由古“𡗗”的形近讹误而来,与“𡗗”的古音义不尽相同。然自宋伊始,二者遂有合并的趋势。究其因果,或许与“高丽姓”在北宋的出现密不可分,此点须另撰专题从宋与高丽政治文化的频繁交流切入。无论如何,后世相关字书,遂将“姁”“𡗗”并见,而后“姁”日渐取代了“𡗗”的音形义,得到更为普泛的使用。如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皓韵》有“姁”“𡗗”(王圻,1986:3138),“二十五有”中亦有“姁”“俞”(王圻,1986:3140),并对该卷“内有字同而音异者”而两见于类目的“姁”阐释云“一音纽,一音好”(王圻,1986:3148)。这无疑就是将“𡗗”“姁”二音合一。另外较有代表的是《说文解字注》(段玉裁,1996:7):

𡗗,姓也。从女,丑声。呼到切。按古音在三部。读如狙。好之古音读如朽。是以《尚书》假𡗗为好也。《商书》曰:“无有作𡗗。”鸿范文。今《尚书》“𡗗”作“好”。此引经说假借也。𡗗本训人姓。好恶自有真字,而壁中古文假𡗗为好,此以见古之假借不必本无其字,是为同声通用之肇端矣。

段玉裁既整合了前人看法,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第一,肯定“𡗗”是形声字,从女,丑声,呼到切;第二,“丑”的古音读“狙”,与“好”的古音“朽”相近;第三,因为读音相近,《尚书》中“𡗗”遂假借为“好”,以此援经为据,成为同声假借通用的肇端。

段玉裁承认“𡗗本训人姓”,“古音读如狙”,看似并未否定宋人对二字合一的观点,但他绝口不训“姁”与“𡗗”二字的演变联系以及“姁”的“高丽人姓”,与其说承接宋人之见,不如说他是直承许慎《说文》而来。段玉裁乃“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黄侃先生(1983:23)说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治学体例是传承汉人“多以经学解释小学”之学术。可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不释“姁”与“𡗗”之关联,并非对文献有所遗漏,只因他学术宗源于汉学,与宋学门径有别罢了。而这位权威的朴学大师不训“姁”义,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姁”字是自宋代出现的事实。

据此,“姁”字音形义,便出现了汉学与宋学两派观点。前者以为“𡗗”乃“呼到切”、“好”义、人姓。至于与“姁”的关联,语焉不详。而后者以为“姁”即“𡗗”,有两义,两音。从形声字构字演变规律来看,似乎宋学推测不无合理。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在发展演变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异体字现象。王力先生(1981:171)将异体字分为四类,“变换各成分位置”便是其中之一,裘锡圭先生(1988:200)表达为“偏旁相同但配置方式不同”。因为构字元素置向变换,构意不变或相近而成的异体字是有一定数量的,例如和一—咏—峰—峯—堇—垠—群—羣—岳—崑等。“姁”“𡗗”为一字,最早出现于《宋本玉篇》中,部件换用过程,也当然有各种内外部社会文化原因,宋代“姁”字的出现,是“𡗗”在汉字长期书写演变过程中,在宋与高丽日益密切频繁的社会文化交流接触中,在活字印刷泛滥而易致讹误等各种内外因作用下的结果,此并非本文赘述范围。宋代出现的“姁”逐渐代替了古“𡗗”字,这已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事实,那么我们便不能循着段玉裁的思路,对这样的改变视而不见了。

2. “姁”非“女”“丑”——“姁”字形声部首滥觞

既明“姁”与“𡗗”有不可割裂的联系,那么无论部首位置如何,此字乃“从女、丑声”的形声字,是汉学与宋学统一的认知。此点却也容易让人疑惑:虽“姁”“𡗗”中字素“丑”仅表音,并不表意,但此字为何偏选择“丑”字为音?这岂不既与现代汉语中“姁”字义南辕北辙,也与古代汉语中的“好”义大相径庭?形声字声符兼表核心义素,“声符有义”,此为古人所公认。造形声字时,于众多同音字中选择某一声符,必然有意义关联。段玉裁(1996:14)“凡形声多兼会意”绝非妄言。既然如此,为何不换用另一音旁,避免“姁”构字的形体意义与实际内涵出现矛盾呢?

首先,声符“丑”在古代汉语中并无“丑陋”义。究其原因,追溯至古今繁简转换中呈现的“一简对多繁”现象。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繁体字用同一简体字代替,同音替代,类推简化,随之而来的意义合并虽在大多数上下文中并无龃龉,然以破坏汉字的表意性为代价,在某些语境中极易出现谬以千里之误。如“才—纔”,在古汉语中,前者是草木之初,后者才是副词,而今以“才”总之,其“初始”含义在无形中就被淘汰了。再如“发—發—髮”,古“發财”和“头髮”并非一字,而今以“发”总之,原字表意之别便不得而知了。又如“卜—蔔”,前者才有“占卜、卜卦”之义,而后者是“蘿蔔”专用字,今以“卜”总之,萝卜的草木属性,便不能从形声字的结构中展示出来。

“丑—醜”同理可证,“丑陋”“丑恶”是用“醜”来表示。《说文·鬼部》(许慎,1963:189)训“醜”：“可恶也。”《广韵》(陈彭年,1912:45):“《释名》曰：‘醜，臭也。如物臭秽也。’”张自烈《正字通》(1996:1260)列举了很多例子,证实“可恶曰醜”“刺人之非曰醜”“溢法威肆行曰醜”“鳖窍曰醜”等属于“醜”的含义。其一云：“《大玄·玄

摘》曰：‘书以好之，夜以醜之。’注：好事在昼，醜事在夜。”《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恶直醜正，实蕃有徒。”显而易见，古汉语“醜”才具有与“好”相对，与“恶”相同的核心理义。

那么“丑”的声旁“丑”核心理义到底为何呢？《说文》（许慎，1963:310）训“丑”为：
丑，纽也。十二月，万物动，用事。象手之形。时加丑，亦举手时也。凡丑之属皆从丑。

许慎认为“丑”本是象形字，本义象手之形，引申为表时辰的“子丑”含义。对于他的观点，后世学者是基本认同的。张自烈（1996:81）认为“丑”的“手”“手械”乃原核心理义，演变为“子丑”是假借，且作为“手”和“子丑”含义的读音是不同的。而“孛九切”才是“丑”的原音，他阐释为：

天开于子，取动立意，生生之端也。地辟于丑，复取静意，从气握丨，象持枢轴阖户之义也。北极出地，南极入地，莫而不移，实为之枢。其动也，中气斡之而旋，故斗运气机，与摄提遥相属也。……丑，孛九切，手扭取物也，或曰手械，别作扭、扭、杼、钅、钮。借为十二辰子丑之丑，敕九切。衄、忸皆以丑为声，孛九切，为音之正。十二辰不可立文，故皆假借。

这不失为一家之言。他对“丑”的读音和假借关系有所修正，但是段玉裁并没对其观点亦步亦趋，反而对作为时辰的“子丑”含义如何由本义假借而来作出了详细辨析：

（丑）纽也。《律历志》曰：“纽牙于丑。”释名曰：“丑，纽也。”寒气自屈纽也。《淮南·天文训》《广雅·释言》皆曰：“丑，纽也。”《糸部》曰：“纽，系也。”一曰：“结而可解。”十二月阴气之固结已渐解，故曰纽也……人于是举手有为。又者，手也，从又。而联缀其三指，象欲为。而凛冽气寒，未得为也。敕九切。三部……上言月。此言日。每日太阳加丑。亦是人举手思奋之时。

“丑”是象形文字，象手；引申为时辰，即丑时。丑时就是举手之时，是“万物动、用事”之时。段氏认为一年中丑时的特征是“纽结解开”“阴气消散”“阳气上通”，此时正乃将春之际，众皆欲举手有为，奋发图事。如果综合张氏、段氏二人看法，概而言之，丑的引申义是从“取物”——“解结”——“举手”——“子丑”一步一步渐进而来。而“凡丑之属皆从丑”，意味着凡是具有“丑”义的字，都用此字素表示。

综合许慎、段玉裁、张自烈的说法，以“丑”为声符的大部分形声字共证，归纳出最大公约数的声符核心理义素与规律，可见“丑”“纽”“扭”“忸”“衄”“钮”“杼”“丑”“丑”“丑”“丑”“羞”“丑”“衄”“衄”“衄”“衄”等，因“凡丑之属皆从丑”，便都多少沾上了“丑”的含义。这可分为几组。一是有“丑”的本义“手”的内涵，例如“羞”，手持羊进献；“扭”，用手揪打；“衄”，用手烤；“丑”，手拿肉食；“杼”，手铐状刑具；等等。二是有“丑”的“解结”之义，如“纽”，结而可解；“钮”，印鼻，配印以带穿之，上栓可解之环。三是以“丑”

为声,就是纯粹的声旁表音功能了,如“妞”“扭”“衄”“扭”“扭”“扭”“扭”“扭”“扭”“扭”等。

以上以“丑”为声符的一组字,有些“声符有义”,有些仅仅“以丑为声”。即便如此,综合古文“丑”所记语音的语义,并无现代汉语简化字“丑”中“丑恶”“丑陋”之义,可见“妞”从诞生之初,其构字义素并不与现代汉语语义抵牾。

3. “妞”与“女孩”——满语与汉语的渐次融合

“丑—醜”含义的南辕北辙,虽是繁简转化体系下产生的普遍现象,但仅以此阐释“妞”字意义的古今演变,却有囫囵吞枣之嫌。从上述分析可见,宋代虽出现了“妞”字,然其本义是“高丽姓氏”或“好”,并没有“小女孩”之义,那后者是如何渐次出现并取代其原核心义的呢?《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953)中,“妞”组了三个词:“妞儿”“妞子”“妞妞”,注释为“女孩子”或“小女孩儿”,且为方言。《汉语大字典》(2003:1003)将“妞”分为两个含义,一是高丽姓氏,二是方言中“对女孩儿的昵称”。《汉字形义分析字典》(1999:390)专门指出,妞“作女孩儿讲是现代义”。那么对应的“高丽姓氏”便是源自宋代的古义了。

“妞”的义符“女”,在古时则亦可用“子”代替。可见最初的“妞”与“女孩”并无绝对意义关联。“𠃉”“𠃊”都可用于“好”的同声通假字,在古文中作“𠃉”,在今文中作“𠃊”。《宋本玉篇·子部》:“𠃉,古文‘好’字。”(陈彭年,1983:529)《集韵·皓韵》:“好,古作‘𠃉’。”(丁度,1983:828)《集韵·号韵》:“无有作‘𠃊’,或从子。”(丁度,1983:1206)也就是说该字的义符在一定程度上可“女”“子”互换。实则直至清中叶,“妞”尚未完全有性别之分。曹廷杰(1985:21)在介绍库页岛沿革形胜以及还境诸小岛时,有一岛名为“妞妞斐颜岛”,注释云:

妞妞斐颜岛。满洲语“妞妞”,呼爱小儿之词。斐,颜色。

“小儿”无论男女,可见在当时的满语里,“妞”并不专属于女姓。《八旗通志》里,有许多“妞”作为姓氏之处,如“以管领妞妞管理,妞妞降革,以管领威和德管理”(鄂尔泰,1983:366);“福勒贺升任,以妞贺管理,妞贺故,以成太管理”(鄂尔泰,1983:429)。诸如此类因官职调迁提及的名字,亦可见其为男性。《八旗通志》(鄂尔泰,1983:332)卷28中载“妞妞”:

妞妞,满洲镶黄旗人。……雍正九年,随靖边大将军公傅尔丹征准噶尔,……力战阵亡,赏卹如例。

《八旗通志》卷127有“正蓝旗满洲马甲妞妞之妻李氏”(鄂尔泰,1983:104),卷256有“正黄旗满洲马甲妞格之妻齐氏”(鄂尔泰,1983:316),此类记录随处可见。《续通志》将“妞氏”正式编入《氏族略》(嵇璜,1983:390),可知“妞”在清代也有姓氏之义,而“妞妞”也非确指女性。而后乾隆道光年间,“妞”释义性别化,倾向于独指女性,

但此时尚未划分年龄层而确指“小女孩”。满汉语境中所用“妞”而遵循的约定俗成年龄范畴也并不一致。满族语“妞妞”虽字面来源于汉,然内涵却有延续满族名称“格格”的意思,即云英未婚的“姑娘”“小女孩”,而汉语人群驳杂流动,地域广袤,“妞妞”一词使用则更广泛。例如主要记录嘉、道间北京民俗风情、艺林掌故的李光庭(1982:54)《乡言解颐》卷三“优伶”条云:

嘟噜胡、馅儿饼,人以声传;秃大汉、胖三妞,技因形肖。

以骈文的语言形式记录了戏剧班的剧演与乱弹,说唱不仅兼合了各种声腔,也化了当时的满、汉各类语调与方言。这“胖三妞”很明显就与“秃大汉”的性别是对应的关系,乃为女性,但并非专指小女孩。“妞妞”尚未分界年龄,仅专指性别的情况延续至清末,王彦威、王亮父子(2015:165)前后辑成的《清季外交史料》,有众多牵涉女性案件的实例,其中书写“妞”处甚多,如:

堂中妇女胡宋氏、谭兰英、李再姑、戴贞姑、刘三妞,被黄之绅、杨琴锡愚弄入堂,其失身也,由于威胁,并非出自本心,应一并免其置议;与孀妇刘吴氏幼女侯佑妞、白香妞、郑么妞、李六毛,均发还建平县,飭令具领干证。

上引档案中的“姑”“妞”杂用,身份有妇女,有遗孀,还有幼女,有的是已婚成年人身份,有的却是幼小女孩。可见当时汉文中“妞妞”含义唯在于性别间,不拘泥于年龄处。而嘉、道间的满语虽被汉语不可逆转地强势演化,然自己的底蕴特征也仍是有迹可循的。例如本是皇族女儿的专有称谓“格格”,在身份地位下降演化为官宦家庭的女儿以后,与“姑娘”含义便接壤起来。满族文学家文康的古典小说《儿女英雄传》是第一部兼用汉、满语写成的小说,客观实录了嘉、道之际满汉两族语言的拉伸搏击、北京方言引用满语词汇的过程,书中两种语言兼用而形成的生疏、流动状态,使得书中旗人的性格更为栩栩如生,在第七回(文康,2018:92)中有:

格格儿,你可别拿着合我的那一瓮子性儿合人家闹。

显然,这里的“格格”是“姑娘”含义。以“格格”为“姑娘”本是建构于满语内部自身的演变系统之下,然由于汉语言的强势风靡,汉语中的“妞妞”与“姑娘”逐渐挂钩起来。“妞妞”在满语中本体之义是“眼珠儿”,经过汉语专指“女子”意义的感染后,满族对爱女、女孩子等称呼“妞妞”,中和了满汉两族的语言内核。《清稗类钞·皇室皇族之女称谓》(徐珂,1984:2182)中载:

若宗室,若觉罗,若闲散八旗,若内府三旗,凡对于未嫁之幼女,皆称妞妞。

《清稗类钞·八旗方言》(徐珂,1984:2225)亦云:

妞儿,姑娘也。

《清稗类钞·小姐姑娘》(徐珂,1984:2185)还对此解释:

姐,姐儿也;轻之之辞也……北方有称姑娘者,旗人尤多,揣其意义,实较小

姐为尊也。既嫁,则称姑太太,或姑奶奶。

实则是将汉语原来“姐姐”的女性性别特殊化为满语“格格”中尊贵身份的未婚闺女,两相糅合而称为“姐姐”,并彻底划清了已嫁女性的称呼,将“姑”缀改为“太太”或“奶奶”。以此来对应众多满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到,他们是遵循了这一满汉语言的中和结果,默认使用“姐姐”的“女孩”“姑娘”含义范畴的。如刚刚提到的《儿女英雄传》(文康,2018:562)中,出现了众多笔涉“姐姐”处,兹举一例:

何小姐最是心热不过的人,听了婆婆这话,一面归着那东西合张姑娘道:

“实在亏婆婆想的这等周到。”安老太太笑道:“姐姐,也不是我想的周到……”

何小姐在文中是“证明守宫砂”之人,文中将何小姐称“姐姐”,是遵循了“姐姐”的年龄划分循例的。又如《清文指要》(张美兰,2013:233):

你的那个姐姐若是不撻,也十几岁了^①。

英国钦差威妥玛(2002)编写的《语言自述集》中《谈论篇》抄录自《清文指要》,此条为:

你们姐儿若不扔,如今也有十几岁了?(《谈论篇百章之87》273页)

该句下有注,但威氏对于此例注释未探本求源,说成“这个字(词)据说来自朝鲜语”。其显然将“姐”在宋代之前的字形、含义演变腰斩,只看到了宋代后的“高丽姓氏”含义。近代日本汉语课本以威氏此书为主,让学生习得抄写,日本静嘉堂文库8册16卷抄本的页面栏外针对此条有“明治十五年(1882)”的学生眉批(2010:53):

眉批:姐→姐,满洲曰“姐儿”,汉人曰“姑娘”,或曰“姐儿”亦可。

批注笔记比《语言自述集》本书更能反映当时北京地区的流行语特点^②。此处对“姐”作注疏,也是因为“姐”字有自身的满族语言内涵与情感色彩,与古汉语“姐”存在不一样的叙述范畴,而满语中的“姐”更符合汉语“姑娘”“姐儿”内核含义,须得加以注释说明。此外,嘉庆年间的满洲镶黄旗大臣托津为上奏白莲教兴起后的剿灭始末,呈《平定教匪纪略》(托津,2002:298),其中数条案宗如:

妻杨氏,生子三人,长男幅昌,次男重庆,三男鹤龄,女姐儿。(《史部》卷16)又(托津,2002:60):

称田米凤有二子,长名元姐儿,十九岁,次名拉姐儿,十二岁,现在不知下落。(《史部》卷39)

上述诸多举例可见,“姐姐”在满族文献中,不约而同严格恪守了由“格格”演化而来的“姑娘”含义,有意识将“姐姐”一词应用于未婚弱龄段,而舍弃了原汉语中的已婚

① 嘉庆十四年三槐堂重刻本此句为:“你那个儿子若是不丢,也有九岁十岁了。”文中引文是嘉庆十四年大酉堂重刻本。

② 日本汉语教育从明治九年(1876)开始从南京官话转为北京官话(参看何盛三,1928:71-72)。

成年女性的年龄杂指范畴。

此外,曹雪芹《红楼梦》成书于乾隆朝,其中使用“姐姐”“姐儿”处甚多,如“我瞧大姐姐这个小模样儿,又有这个聪明儿,只怕将来比凤姐姐还强呢”,“王夫人也哭道:‘姐儿不用着急。’”(曹雪芹,2015:538)可见远绍于清中叶,“姐姐”满语使用的年龄弱化、“姑娘”含义固化,已经有成熟的使用文献可证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姐姐”是满汉两族语言在清中后叶始次第交融的产物,然两种语言的熔铸,自然也有一个从分割到合流的历程。这不仅体现于“姐”使用的南北地域有语言实践习惯的不同,还体现于该词的感情色彩转移演化。前者因为地域局限而致语言传用随民族人口分布而各异,后者实际上体现了满语自身体系的重构、完善与接纳汉语的双重演化过程。

首先,“姐”的使用有地域之别,尤其在生活口语使用层面,生活于乾隆朝的郝懿行(2002:467)《证俗文》卷4有载:

青、徐州呼女曰媮媮,忤也。女始生,人意不喜,忤忤然也。《释名》案:“媮”音“误”。《广韵》又音“吾”。《埤仓》美女也。今京师谓女曰“姐姐”,亦作“姦”,音“纽”,呼为“姐姐”。若大曰“大姐”,次曰“二姐”,又次曰“三姐”。

郝懿行所谓的京师谓女曰“姐姐”,青、徐呼“媮媮”,显然是地域方言分化且发展不平衡的投射。梁章钜(1996:91)《称谓录》亦有文献条录,可与《证俗文》两相呼应:

媮 《方言》吴人谓女曰“媮”。《释名》云:青、徐州呼女曰媮,媮,忤也。女始生,人意不喜,忤忤然也。

珠娘 《闽小记》:福州呼女亦曰“珠娘”。

阿娇 《辍耕录》:关中以儿女为“阿娇”。

奥姑 《辽史·公主表》: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礼,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之奥,谓之“奥姑”。

若以“姐”字的“姑娘”“女孩”“女性”之义求之,南北方与京师的称谓习惯显然是不同的,附带的地域痕迹,跟南方远离京城,人口流动驳杂,方言众多,而满族旗人却大多集中于京师附近有关。俞正燮《癸巳存稿》(1937:473)亦载:

孃者,少女之称,亦作娘,转作姐。北人称姐姐,南人称娘娘是也。南人音亦转孃,苏湖言某老孃是也,倪、婴、婴,方言不同,亦转为姐,其义亦同。诗《季女斯饥》笺云:“弱者之称。”则呼小儿曰姐,曰娘,曰妹,亦诗季女义也。

“姐”的音变,与方言调律尤其是南方的音腔杂芜、辅音变化、古音保留等语言特色互为匹配,因此出现了“姐”与“娘”“孃”之间的转音现象,然其“弱女”之义已缓缓趋同。北方地区,尤其是满汉接触颇多、语言融合程度较强的“京师”,称少女为“姐姐”已相当普遍。正如前引《清稗类钞》中“八旗方言”条,也是“姐”在八旗聚居的京师

而成为满族雅言常用语的例证。

满汉“妞”的语调虽有音转,但语义已渐趋同,然细究其间,仍然有感情色彩的偏差。此偏差并非显性的叙述,除去与南北风俗观念潜移默化之关联(如前引《称谓录》吴人、青徐州生女不喜,以“忬忬然”音代之“媼”,而京师却以“𡗗”代之),事实上还与满语经过汉语的冲撞而自身内部体系的演变、重组、建构有关。满语中本也有“妞妞”,那我们为何认为满语中的“妞妞”是由汉语“妞妞”内蕴引入而来呢?因为“妞妞”在满语中最初并非贵族旗人的雅言,反而是极其口语化的俗语,跟它后来的“格格—姑娘”含义演变实则未曾接壤,是割裂的。奕赓《佳梦轩丛著之八·管见所及》(1994:87)中提道:

我朝在东土时,上古纯风,朴而不雕,故满洲、蒙古命名,多不取吉祥字面,有七十三、八十四、五十、六十之名,又有骚达子、白达子、二妞、黑小子、白小子、妞妞等名,正蓝旗轻车都尉名六十儿,厢蓝旗云骑尉名老米,皆乾隆间人也……可知“妞妞”与“二妞”在“我朝东土”时,即未入关接受汉族文化以前,被归为“不取吉祥字面”的名字,此处“吉祥”实则并非今日之“吉利”,乃指代日常俗语、口语化,与雅言是相对的,此条追溯了满语“妞妞”最初的下里巴人的本体内蕴。以此亦能窥见“妞妞”在未汉化的满语中,与后来的比“小姐”称呼更为尊贵的“姑娘”含义毫无关涉,甚至性别也可为男性(前已论之)。而满语在自身体系重构下,将“格格—姑娘—妞妞”含义关联起来,显然是接受了古汉语“妞”字中的“好”含义;而将“妞妞”特指为女性,则是接受了汉语中“妞”的性别专名演变结果。

在旗人小说、满族文献或旅居于京师附近的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妞妞”的使用与纯粹南方作家隐藏于字里行间中的内涵认知与情感从属也有细微区别。例如满族民歌《寄生草》与江南本土小说《孽海花》中“妞妞”的情感从属,便是有异有同的:

有一个妞妞儿在门前立,抬头看见个挑担的……欲要买,作女孩儿的怎出去? (《寄生草》)

宫里唤金妃做大妞儿,宝妃做二妞儿,都生得清丽文秀。(《孽海花》)

那天是内务府红郎中官庆家的寿事,堂会戏唱得非常热闹,只为官庆原是个纨绔班头,最喜欢听戏。他的姑娘叫做五妞儿,虽然容貌平常,却是风流放诞,常常假扮了男装上馆子、逛戏园,京师里出名的女戏迷。(《孽海花》)

表面上但看两书“妞”的运用,似乎仅是年龄的不同,这本可归为汉满语言尚未完全融化、尚留存本民族观念的阐释,但其中的确也潜藏了些许情感差异。首先,满族民歌是“妞妞”合用,写出了娇弱怜爱、楚楚动人的未嫁女孩子的腼腆羞涩,而《孽海花》的作者金松岑、曾朴都是江苏人,记叙语言自然地夹杂了苏州地方语,其中的民间谚语、俗语也多隶属吴语体系,且这部本来是讽刺谴责小说,上举两例,一说的是宫里

的皇帝嫔妃,二说的是满族豪奢大臣家的纨绔女儿,对“妞”的描绘对象都有贬义的反讽语调,因而单用一“妞”,而并未“妞妞”连用,笔下亦藏微言。无独有偶,同为谴责小说的《老残游记》,也是如此单用“妞”字。刘鹗(2001:10)在小说中写到了两个山东曲艺界梨花大鼓的代表艺人16岁的“白妞黑妞姊妹两个”。两人吸收皮簧、梆子、昆曲及临清小曲和众多新腔,使得梨花大鼓,也即后来的山东大鼓呈现出新的韵味,《明湖居听书》一段就是描写白妞精湛高亢的演唱技艺的。虽是赞誉之辞,但细究其所指代人的身份,是卖唱的歌舞艺人,社会地位低下。换言之,此“妞”的隐述式身份,离满语中“格格—姑娘—妞妞”的“可爱小女孩”情感色彩,是有一定差距的。此隐形式的差异,存在于满汉作家的潜在性共知中,下笔行文时时有涌现。延续至现代满族文学家老舍《骆驼祥子》中塑造的一个著名女性形象——祥子的妻子、性格强势的“虎妞”,老舍先生将虎妞这个名字,与泼辣爽利、强悍自主甚至市侩的形象关联起来,这与文中名为“小福子”的另一人物——代表着传统柔弱温顺、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对比,判然有别。

4. 结论

现代汉语是在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基础上生成的。17世纪以后,满语与汉语杂糅而成的“京腔儿”自然遗留了下来。“妞妞”便是满语 Nio nio ([nio:nio:])的汉字音记,也保留着满族“未婚女孩”的内涵。因此,把未婚小女孩称“妞”体现了自清代中后叶伊始的“满式汉语”的语言特点。随着现代汉语的规范与普及,“妞”作为“小女孩”这个并不悠久的历史含义趋于成熟,然而古汉语中“妞”的“好”“高丽姓”义乃至更为遥远的包含声旁“丑”含义的相关义素,却逐渐废弛。我们以“妞”一斑窥豹,看到满汉两大语言体系从分据割裂而至义理通释,在融合创变中却仍封存各自的民族传统观念、情感的复杂过程,也能看到今日的“北京话”(即京腔)不能片面以满汉两族语言撞击融合而一贯视之,还有两方内部的语言形塑和修补过程,以及各自的“残留碎片”存于其中,这些因素如“妞”一样,有的能从今日北京方言遗留的表象中追溯到曾经分歧的源头。

参考文献

- [汉]许慎 1963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宋]陈彭年 1912 《广韵》,中华书局。
[宋]陈彭年 1983 《宋本玉篇》,中国书店。
[宋]邓名世(著) 王力平(点校) 2006 《古今姓氏书辩证》,江西人民出版社。
[宋]丁度 1983 《集韵》,中国书店。

- [宋]司马光 1987 《类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 [明]王圻 1986 《续文献通考》，现代出版社。
- [清]曹廷杰 1985 《东北边防辑要》，《曹廷杰集》，中华书局。
- [清]曹雪芹 高鹗 2015 《红楼梦》，武汉大学出版社。
- [清]段玉裁 1996 《说文解字注》，商务印书馆。
- [清]鄂尔泰等 1983 《八旗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64、668、669 册，商务印书馆。
- [清]郝懿行 2002 《证俗文》，《续修四库全书》第 19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嵇璜等 1983 《钦定续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93 册，商务印书馆。
- [清]李光庭 1982 《乡言解颐》，中华书局。
- [清]梁章钜 郑珍(撰) 冯慧民等(点校) 1996 《称谓录 亲属记》，中华书局。
- [清]刘鹗 2001 《老残游记》，中华书局。
- [清]托津 2002 《平定教匪纪略》，《续修四库全书》第 401、40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王彦威 王亮 2015 《清季外交史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清]文康 2018 《儿女英雄传》，华文出版社。
- [清]徐珂 1984 《清稗类钞》，中华书局。
- [清]奕赓(著) 雷大受(校点) 1994 《佳梦轩丛著》，北京古籍出版社。
- [清]俞正燮 1937 《癸巳存稿》，商务印书馆。
- [清]曾朴 2001 《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张自烈(编) 廖文英(补) 1996 《正字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曹先擢 苏培成 1999 《汉字形义分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 2003 《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
- 何盛三 1928 《北京官话文法》，太平洋书房。
- 黄侃 1983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陆襄(主编) 翁敏华(编) 2000 《明清小曲三百首》，上海远东出版社。
- 裘锡圭 1988 《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
- 王力 1981 《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 张美兰 刘曼 2013 《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16 《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商务印书馆。
- [日]内田庆市 2010 《〈语言自述集〉源流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
《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 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东方出版社。
- [英]威妥玛(著) 张卫东(译) 2002 《语言自述集——19 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志军)